

当前社会有一种现象，总将出现的问题归结于特殊阶段，诸如食品安全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环境污染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贪污腐败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社会分化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等等。似乎只要还处于这个阶段，出现问题就不可避免，有了问题就可以免责。而只要过了这阶段，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解决了。对这种“特殊阶段论”，要予以警觉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每一个阶段都是特殊的阶段。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问题。

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；从封闭转向开放，并面向全球化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复杂的转型，这么迅速的转变，的确史无前例，出现问题的概率自然比较大。

然而，阶段特殊性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能无限夸大，更不能因此礼崩乐坏。社会发展有一定的通则，最基本的要求既不能随地域变化而改变，也不能随时段的变化而改变。比如食品安全的标准之类，是依照健康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。不能说一个时期需要注意健康，另一个时期就可以随意损害健康了。是否损害健康是底线，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例外。

客观上存在的特殊阶段是一回事，主观上如何对待这个阶段又是另一回事。一种消极的态度是，对特殊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放任自流，不闻不问，于是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，把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。一种更为负面的态度是，借口特殊阶段，以此规避社会约束，钻发展的空子，牟取不当利益，使得不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。而一旦出现问题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时，特殊阶段成了一张推卸社会责任的挡箭牌，成了一块掩盖社会良知的遮羞布。

由此看来，对特殊阶段持积极的态度非常紧要。越是处在特殊时段，越是要提高警觉以克服麻痹心理，越是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防微杜渐，尽力将问题减到最少，将影响降到最低。疾风知劲草。特殊阶段难道不是考验、拷问人们的社会良知的特殊时刻么？（摘自《东方早报》11.7 陶文昭/文）

规则的力度

最近看到了三个故事。

第一个讲的是“二战”期间，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.9%，这就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，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。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%才行。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，99.9%已是极限，除非出现奇迹。军方就改变了检查制度，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，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。从此，奇迹出现了，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。

第二个故事，讲的是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，因为那儿地广人稀，尚未开发，英政府就鼓励国民移民到澳洲，可是当时澳洲非常落后，没有人愿意去。英国政府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把罪犯送到澳洲去。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只运送犯人，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，多运多赚钱。很快政府发现这样做有很大弊端，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高，平均超过了10%，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37%。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，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，限制装船数量等等，却都实施

企业家的自我救赎

在接受《财经》杂志的专访时，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，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，“是很脆弱的阶层。”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，其一是不敢抗争：“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，企业家没有勇气、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，只能尽量少受损失。”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：“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，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，没有‘以天下为己任’的精神。”

当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，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《倒转“红轮”：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中，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。

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，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，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。但是，他们所有这些努力，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。最致命的因素，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，即他们的二元人格。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，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，坐在特权这一边。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、言与

从古而今，人们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和行为——“嫉恨”，它具有嫉妒、羡慕、崇拜、痛恨等极其复杂的意涵。我们都知道人类生而不平等，有的人命好，有的人命坏。命好的人生

嫉恨可以催生正面力量



在豪门世家，他们从小即受到比别人好的教育，长大后又有人提携，人生极为顺利，可以享尽荣华富贵，娶娇妻，生儿育女，家世繁衍。这种人通常会成为别人嫉妒羡慕的对象。嫉妒心最强的人，甚至会出现极恨的情绪。因此在任何社会都不鼓励嫉妒和嫉恨这种品质。有的社会会要求命好的人自我节制，不要因为命好就得意张狂，或要这种命好的人多多行善，不要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。

但到了现代，由于心理学和哲

新锐短评

改革本身的公平性

改革必须突破樊篱，但这种突破不可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办法，而是要善于利益博弈。这种博弈不能仅靠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勇气，还要靠“求取最大公约数”的智慧。面对利益博弈，还需要一个基本的价值观，这就是公平。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但改革本身即有一个公平性问题。只有不受各利益主体的左右，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，改革才能赢得人心。

（摘自《京华时报》11.11 吴乔/文）

“屌丝”成流行语的背后

“屌丝”，原为粗语，现今已成为青年群体中的流行语和文汇现象。这是社会原因在青年群体中的直接映照与投射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使贫富差距加大，“屌丝”式的自嘲，就源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，以及流行的择偶审美标准。许多青年面对的现实是，即使竭尽全力去奋斗，自己财富的积累与“高富帅”、“白富美”所拥有的基础与条件还是相差很远。所以，不难理解“屌丝”那种复杂心情的表达，既有对现实的不满，也有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；既有对“高富帅”与“白富美”的羡慕嫉妒，也有对他们的不屑。
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11.12 王玉香/文）

“劫富济贫”须走法治化路径

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，关键是要对垄断行业收入进行法律规制。控制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暴利，矫正企业高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畸高，是公认的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和重点，而打破垄断集团利益，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最有力的手段是法治。另外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涉及的一些领域，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、工资制度改革等，需要进入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。如此才能赋予收入分配改革充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。

（摘自《法制日报》11.8 许平/文）

艰辛的“对调”团圆之路

对调工作，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，它涉及到户口、单位编制，手续繁琐复杂，但这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、远离家乡等问题的唯一办法。他们在城市某个特定的地方，电线杆、行道树上贴上自己的对调启事，留下联系地址，等有人来联系。只要双方单位性质(全民、集体)一样，就可以写对调报告，经审批后，就可以办理商调手续。当然，审批也是很麻烦的，还要审查对方的家庭出身、政治面貌等等。这过程很漫长，有的要等一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……

闷棍：人口不对等

在北大荒整整奋斗了11个年头，1978年11月我随知青的返城浪潮，也办回了北京。因为我爱人高金凤是上海知青，不能直接办到北京。1979年3月，她在北京生下了我们的儿子，才过两个月她就抱着孩子，匆匆回上海落户去了。从此，我们开始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我俩不止一次地互相鼓励，一定要冲破千难万阻，为早日团聚而努力！

那些日子，我托付所有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战友帮我关注所有这方面的信息。北京的电线杆被我抚摸了不少，因为那时对调的小广告都贴在上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1980年底时，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调人——北京第六制药厂的女职工吕秀芬。他的丈夫董沪琪在上海，他俩也是兵团战友，也一直在努力奔走，苦寻对调目标。我们见面后，聊得非常开心，很快达成了协议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各自从北京、上海，同时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对调申请。

吕秀芬工作的第六制药厂属于西城区劳动局管辖，对调手续要在那儿办理。于是我有空就往西城区劳动局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得到了确切消息，商调函已到，双方情况属实。但还是不能办，因为我儿子的户口要随他母亲，是两口子进北京，而吕秀芬的确没有小孩，是一口人入沪，双方条件存在差异，不能对调。

听到这个结果，我感觉真像当头挨了一棒。我懵懵

■ ■ ■ ■

『红色通缉令』背后的外交旧事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哥伦比亚担当大使，期间遇到了一件关于红色通缉令的麻烦事儿。

某日上午，上班后不久，哥方安全局来电话称，有一名

名叫桑继辉的中国公民进入哥伦比亚，从其姓名、指纹和长相

等情况看来，很可能就是国际刑警组织“红色通缉令”通缉

的经济罪犯桑继辉本人。

经询问我国公安部得知：桑继辉曾任中国在中东地区某公司的翻译，数月内携10万美元逃跑，国际刑警组织根据我国要求已发出“红色通缉令”，希望我做好驻在国工作，务必把桑继辉缉拿归案。

我们立刻和哥方交涉，哥安全局答应一定帮助，这也是他们的国际义务。

经过两个星期的进一步查证，哥方认为证据确凿。当桑继辉某日回到波哥大时，哥安全局立即将其逮捕。随后哥方通知我们，要求在24小时内将桑继辉交中国使馆处理，否则哥方只能将其驱逐出境(按照哥方法律，拘留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)。

这一下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。如果交给我们，我们小小使馆如何能看管得了？如何把他押送回国，也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因为哥伦比亚同我国没有直航。

我们要求哥方协助押送桑继辉到北京交我公安部门处理。但他们的局长玛沙将军不同意。于是我只好采取外交行动，紧急照会哥方，并写信给玛沙将军，说使馆正在同我公安部联系交接事宜，预计很快会有答复，要求哥方此前暂勿采取行动，我们并重申希望哥方派人把桑犯押送北京。

为稳妥起见，我又请哥国防部长波特罗上将帮助做玛沙将军的工作，波当即答应帮忙。

次日早晨九时半，安全局一位处长来电话，说玛沙将军已同意，将派一有经验的安全官员 X 警官同中国官员一起押送桑到北京。我们对安全局的合作表示感谢，并迅速办理了有关手续。

第三天下午，哥方即把桑继辉押解至机场。上机前，X警官给犯人戴上了手铐，然后又同自己的左手腕连铐起来，动作非常熟练。在这么做时，X警官还有礼貌地对犯人说，对不起，这是规矩。接着又向我方陪同的张秘书解释说，这是工作需要和制度，他必须这么做。

嫌犯终于被顺利地押送北京归案，我公安部门热情款待 X 警官，并拟致谢电。经过二三十小时同犯人连铐旅行，他仍是笑容满面，最后只收了一套中国的绣花睡衣以示执行“红色通缉令”和到达北京的纪念。

（摘自《环球》第20期 王喁生/文）

那事

懂地跑到小吕家，责怪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？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：因为患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所以他们从没打算要孩子。

第二天，我请假来到市劳动局信访办，把我们的情况详细做了叙述。当时接待我的干部还是个老同志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想要对调工作，人员户口一定要对等，不能上海少了个户口，北京多了个户口。那样绝对不行！”“你们双方要对调，就让北京的这个同志生孩子再对调，否则就重新再找个有孩子的人对调。”

对策：心脏病人冒险怀孕

晚上，我急忙给上海的董沪琪打长途电话，他听后说让他认真考虑考虑。三天后，小董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为了战友，为了朋友，为了我们俩个家庭，今天我俩君子协议，我豁出去了，决定要个孩子！”

1982年夏天，小吕成功怀孕。我掐着指头过日子，两个月，3个月——6个月——9个月，在这当中，我经常买些好吃的东西送到小吕家并问寒问暖。因她身体欠佳，很是担心，恐怕出现任何意外。说句实话，我爱人怀孕时，我都没有这么尽心尽责，现在想想真有些愧疚。

冷水：单位性质不一样

孩子出生，母女平安。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和董沪琪天不亮就来到西城区劳动局，8点整，我们第一个冲进接待室，递上“关键”材料，“出生证、户口本。”期待的目光紧盯着工作人员，他拿出我们其他材料，仔细的看了看，然后皱了皱眉头，开腔了：“上海要来北京的这个人是

大集体企业，北京要去上海的这个人是全民企业，全民、集体不能对调！”一盆冷水，不！是一缸冰冷冰冷的水从天而降，浇得我俩目瞪口呆。

随后几天都是在恍恍惚惚之中度过的。我考虑再三，

下定决心，决不放弃，一定要继续努力。

解决：战友哥哥帮忙

一天傍晚，小董突然来到我家，说他一个兵团战友的哥哥是某某大企业管劳资的领导，同西城区劳动局的关

那一年，莫言卖书没要钱

记得那一年，我见到莫言时，是他最尴尬的时刻。那是1986年6月29日，我在北京，那天莫言在王府井书店卖书，跟他一起卖书的还有王蒙、张贤亮、刘索拉等人。那也许是现代中国作家首次签名售书吧，我没有考证。反正那天人不多，王蒙、张贤亮和刘索拉的台前有排队的人，莫言的台前没人，这种鲜明的对照，令莫言很尴尬，他一个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，卖自己的书，如何卖得过王蒙和张贤亮？虽然刘索拉也是年轻人，但好歹是个美女，总有读者青睐的。唯莫言此刻寂寞无比，站起身来在大厅里溜达过来溜达过去，看上去很失落。

我那时算是阅读面比较广的人，也读过莫言，彼此看上去也都是年轻人，顺眼，于是跟他闲聊起来。聊他的作品，他很兴奋，那双小眯缝眼里流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很感激的样子看着我。于是我决定买他的书，让他签名，心里想一定要给这个年轻人信心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到他的台前，拿出一本书，刷刷地签了名，递给我说：这本书送你了！

这我可为难了，人家来卖书的，怎么可以送？他说：对你，不卖，送你了。

我看了看手里的书，书名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定价2.20元，印数6000册，于是收下了。然后，当然是说了一堆好听的，再然后就互留了电话，那是1986年我们都没有手机，留的都是单位的电话。（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熊昌烈/文）

中俄外长“斗嘴”黑瞎子岛

2008年12月17日，李肇星应邀到河北工程大学演讲时，披露了一些外交事件的花絮。

2005年，中俄签署“互换《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》的批准书的证书”时，俄罗斯外长向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星征求《协定》的具体签署日期。李肇星说：“当时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最喜欢过‘六一’儿童节，对少先队的美好时光印象深刻。所以，我表示最好6月1日签字，这也符合双方领导的共识。后因对方送文件的飞机晚点等原因，工作失误，致使6月2日才签。但毕竟我们将祖国的部分领土重新划入了国家版图！”

该协定的签署，最终解决了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划分问题，其中收回的领土中，就包括备受国民关注的黑瞎子岛。李肇星说：“1929

年5月，中国的黑瞎子岛一直被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所占领，我国政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才拿回了部分领土。其难度可想而知。”

我国收回了黑瞎子岛的一大半。对此，俄罗斯外长对李肇星“诉苦”：“我们占领了黑瞎子岛已经70多年了，现在竟让你们拿回了大部分的黑瞎子岛。朋友，我受的压力太大了，俄国有些民众对我非常不满，认为我卖国。”李肇星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俄国人口大概1亿左右，而我身后13亿人看着，我的压力比你大多啦。现在，许多中国人对我不满意，他们认为黑瞎子岛应该全部回归中国才对！”

（摘自《文汇报书周报》10.26 胡线勤/文）

那语